

【马克思主义理论】

论知性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与实践的反思

刘 强

(长安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 要: 知性是认识论中很重要的一个范畴, 康德提出认识应当遵循从“感性认识——知性认识——理性认识”的认识路线; 黑格尔进一步提出由“感性认识——知性认识——消极理性——积极理性”的认识路线; 而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持从“感性认识——理性认识”的两阶段论的认识路线, 忽视对知性范畴的研究, 忽视知性思维阶段的地位和作用, 致使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 and 实践中走了弯路, 犯了错误, 受到了损失。

关键词: 知性; 知性与感性; 知性与理性; 反思

中图分类号: B0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4)03-0025-04

Understanding of perception

——the review on socialist theory and practice in our country

LIU Q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Understanding is an important category in the theory of cognition. Kant suggests that cognition is fin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ss of “sense——perception——rational”. Hegel further puts forward the cognition process of “sense——understanding——negative rational——positive rational”. The cognition process we have adhered to for a long time is from “sense” to “rational”. So the study of understanding category is ignored and the function and status of understanding stage are paid no attention to. Thus delays and mistakes have been made in socialist cognition and practice, and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lots of losses result.

Key words: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and sense; understanding and rational; review

早在18世纪, 康德就提出了知性的概念, 认为认识应该遵循从“感性认识——知性认识——理性认识”的认识路线^[1]。黑格尔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思想, 他把人们的认识过程分解为四个阶段: 感性认识——知性认识——消极理性——积极理性, 并对知性这一概念做了系统的阐述。长期以来, 我们在认识方法论上, 一直坚持从“感性认识——理性认识”的两阶段论的认识观, 而对知性认识这一范畴在理论上一直未能进行深入的研究。笔者以为, 我们

建国以来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屡犯错误, 与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这一简单的认识方法论有直接的关系。

一、康德关于知识的基本思想

康德认为, 人的认识活动既不是如经验论派所说的那样消极地联结感觉印象, 也不是如唯理论派所说的那样, 撇开经验, 消极地分析概念, 而是认识能力运用先天知识形式能动地“综合统一”感觉材料, 一方面

形成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和越来越扩大的科学知识体系,一方面形成科学知识的对象的过程。由此出发,他把人类的认识能力区分为三个环节,它们的活动构成同一认识过程的三个不同阶段,即“感性”、“知性”和“理性”。^[2]康德认为,人们的认识首先是从感性进到知性的,他把知性规定为联系到直观以思维对象的能力。他认为,知性思维是认识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知性把感性提供的分散而无联系的材料“综合统一”起来,即加以改造制作,使之获得知识的意义。知性和感性是两种不同的认识能力。感性是被动的,其职能在于提供对象;知性是能动的,其职能在于思维对象。感性不能思维,即不能产生概念;知性不能直观,即不能产生对于对象的直接知识。两者虽然有这么大的区别,但并没有优劣之分,我们不能只要其一,不要其二,因为无感性就没有对象提供给我们,思维就没有了内容;无知性就没有什么来思维所提供的对象,直观就没有了概念,而只是一堆零散的材料。因此,康德说:“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只有当它们联合起来时才能产生知识。”^[3]可见,康德所谓的知性思维已经进入到我们所说的理性认识范围。

康德认为,思维的综合统一活动到知性还没有达到最高阶段,还必须从知性上升到理性。他说:“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开始,从而前进到理智,而以理性为结束,过此,在我们里面就再碰不见什么更高级的能力,来把直观的材料精制而归到思维的最高统一的了。”^[4]康德所谓理性,是指人心中要求把知性所得到的各种知识、原则、定律等,再加以“综合统一”,把它们改造制作、加工整理为最高最完整的系统,以达到把握无条件的绝对的知识的的能力。他认为,感性和知性所认识的只是现象世界中的东西,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不完整的;而人心却不满足于认识这样的“对象”,而有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的倾向,要求认识无条件的、绝对的、完整的统一体,也就是要求认识现象世界之外的“本体界”,即“物自体”世界,这就是所谓“理性”。

二、黑格尔辩证的知性观

黑格尔对康德认识观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同时又对他的知性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小逻辑》中指出:“康德是最早明确提出知性与理性的区别的人。他明确地指出:知性以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事物为对象,而理性则以无限的和无条件的事物为对象。他指出只是基

于经验的知性知识的有限性,并称其内容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康德哲学之一重大成果。”^[4]黑格尔在批判地继承康德认识方法论的基础上,系统的阐明了他的认识方法论。黑格尔按照“正、反、合”三段式,将人类把握“具体概念”的能力分为三个阶段或三个方面。从辩证法的高度把知性、消极理性、积极理性三个阶段看成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他在“逻辑学概念的进一步规定和部门划分”一节中,开宗明义就讲到:“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理智)的方面,(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C)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4]这就是说每一个逻辑真实体(具体真理)都包含知性、消极理性和积极理性三个环节,此三者也是理性认识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黑格尔认为在“正、反、合”三段式中,“正”是知性思维的结果,知性已经跨入了理性思维的门槛。知性是能动的,知性的活动离不开感性;知性对感性提供的具体事物进行抽象和分离;知性提供的规定性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概念,与感性相比,它在认识上是一种飞跃。它是用概念去把握对象的一种认识活动。它的作用在于对大量感性经验材料进行描述和分析,把事物矛盾的侧面加以区分,在偶然与必然、有限与无限、个别与一般、抽象与具体之间发现彼此的区别和对立,做出独立的、明确的判断。这表明知性已经进入思维阶段。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思维无疑地首先是知性的思维”。^[4]但是知性所达到的普遍性、概念,不能理解事物的整体、本质和内在联系,不是表述自在自为的真理的真正形式。而要达到这一真理的真正形式,就必须进入到积极理性(又称“玄思理性”)。在这一过程中,还要经过消极理性(辩证理性)阶段。

“正、反、合”中的第二项“反”,是消极理性的结果。关于消极理性,就是将知性的一些规定性消解为无。黑格尔指出:“在辩证的阶段,这些有限的概念扬弃它们自身,并且过渡到它们的反面”。^[4]黑格尔这里所说的“有限的概念”就是指“正”阶段的概念。在这一阶段,思维认识到概念之间是互相排斥、互相矛盾,并因互相矛盾而相互转化。这就克服了知性的孤立的规定性,使其与别的规定性处于关系中。思维在这个阶段是否定的和辩证的,因为它把知性的规定消解为无。但是,消极理性只是认识到正与反,肯定与否定对立双方相互矛盾而互相转化。而没有看到矛盾的普遍性。黑格尔认为,“理性”不能满足于这个阶段。“哲学不能……仅停留在矛盾

辩证的消极结果。”因为思维在这个阶段中把否定仅只看成是“单纯的否定”，这是“消极的”。而实际上，否定同时也是肯定。因此，“消极理性”的阶段必须过渡到“积极理性”的阶段，只有“积极的”理性才能于概念的对立中而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或于对立双方之分离和过渡中，而认识它们包含的肯定。所以，“正、反、合”中的第三阶段“合”——对立面的统一，乃是“积极理性”的产物。

关于积极理性阶段，黑格尔是这样表述的：“思辨的阶段或肯定理性的阶段在对立的规定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或在对立双方的分解过渡中，认识到它们所包含的肯定”。^[4]这是逻辑思维形式的第三方面或者是理性认识的第三阶段，是认识真理的完善方式。这个阶段之所以是“积极的”，是因为在这里，“反”不再象第二阶段那样只是对“正”的单纯的否定，而是回过头来对“正”作了积极的规定。就是说，“积极理性”就是把对立双方看成是同一个统一体的不可分离的两个组成部分。所以黑格尔说：“理性是积极的，因为它是包括了殊相于其内的共相之源泉。”黑格尔这里所说的“殊相”就是指特殊的东西，“共相”即指普遍的东西。它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取得具体的普遍性、具体概念（思辨的真理）。思辨真理是全面具体的，其中主观与客观既是同一的，又是有区别的，单说哪一方面都是片面的。

以上三个阶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是这三个阶段不是平等并列的。逻辑真实体的每个较高的环节都包含较低的环节，即消极理性包含有知性，积极理性则既包含有知性，也包含有消极理性。黑格尔指出：“思辨逻辑内包含有单纯的知性逻辑，而且从前者即可抽得出后者。我们只消把思辨逻辑中辩证法的和理性的成分排除掉，就可以得到知性逻辑。”^[4]即在它们三者中，知性和消极理性都是思维达到积极理性所必经的阶段。而积极理性才是思维的最高阶段，也只有到了这个阶段，才能全面地、具体地、深刻地把握事物。故黑格尔把这个阶段又称为“玄思的理性”阶段，“玄思的”一词包含着“最高的理性”原则，即对立面统一的原则。黑格尔曾称他自己的哲学为“玄思的”哲学，就是因为“玄思的”哲学是以对立面的统一为最高原则的哲学。

三、知性认识的基本内涵及其特征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康德到黑格尔不仅把知性作为认识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对知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和特征也作了明确的界定，概括起来，

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知性是一种思维活动，是形成抽象概念的能力。黑格尔所说的“知性”、“消极理性”和“积极理性”，都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理性认识阶段。他关于思维能力的三分法，是对康德思想的发展。康德把人的理性认识阶段分为“知性”和“理性”，明确地看到，理性认识的初级阶段即“知性”认识阶段还只是形式逻辑的认识，而在理性认识的高级阶段（“理性”）里，则必然出现矛盾。黑格尔很赞赏康德的这一思想并发展了他的这一思想。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知性认识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理性认识阶段，属于理性认识阶段的初级认识阶段。

第二，知性的职责在于确定每一对象或概念的固定的规定性，以及各规定性之间的差别。知性把每一有限的抽象概念，都看成是孤立自存的。知性注意的是个别和区别，而不是整体和联系。就是说，知性思维活动只能产生有限规定，是一种只能在有限规定中活动的思维。何为“有限规定”？就是指知性思维认识事物只是局部范围，只是对感性事物的表面的、外在的概括和整理，即下定义。所以说，“非此即彼”是知性的一大特点。贺麟教授对此解释说：“知性，即理解力，是形成抽象概念的能力。它是分析、划分界线、下定义、规定的性能。它是有限思维的能力，对局部的对象加以思维。这种思维，是我们所说的形而上学的思维。知性能在现实事物中发现规律和联系。”他还进一步解释说：“知性有时译作‘理智’。理智充满着抽象的、作出区别的、作出形式推论的思维活动。理智、情感、意志三者联系起来或对立起来看时，则以叫做或译作理智较好”。^[5]这一解释，就使我们比较清楚地理解了“知性”概念的涵义。

第三，对于感性认识而言，知性是对感性的否定和进一步提升。黑格尔说，“知性的特点仅在于认识到范畴和概念的抽象性，亦即片面性和有限性”。^[4]就是说，知性是人们不满足于对感性现象的把握从而进一步追寻其本质的活动。感性的东西是个别的，知性对它采取分离和抽象的方法进行肢解；知性的任务在于对被分解的浑沌的感性整体作出彼此相对独立的各种确定不移的规定。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知性是直接的直观，是感觉的反面，同时，也是对感觉的提高。这就把知性与感性明确区分开来。

第四，知性只是思维或概念的一个环节，并不能完全表达整个思维或概念，思维固然离不开知性，但是也决不能停滞在知性阶段，它必然要上升到理性阶段。对于理性而言，知性是对事物局部的抽象，而

理性则是对事物整体的抽象;知性是有限的,理性则是无限的;知性思维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明显地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而理性思维则是辩证的思维。但就整个认识过程中而言,它们都具有抽象思维的能力。所以,黑格尔进一步强调说:真理不能用有限的范畴表达,凡有限之物莫不扬弃自身,过渡到自己的反面。而辩证法正是对知性的内在超越,理性思维也就是对知性思维的内在超越。

第五,理性并不直接与感性世界发生联系,而是在对感性进行知性规定的基础上进行辩证的分析。知性则以感性为直接认识对象。理性对感性的依赖表现为理性对知性的仰仗。因此,可以说跳过知性这一中介环节是无法实现理性认识的。

四、知性认识在实践中的作用及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

人们的认识活动离不开知性这一认识环节。没有知性,也就不可能有坚定性和规定性。而没有坚定性和规定性,也就不可能有各类知识。就是说,知性在整个认识发展过程中处于特殊的地位,具有独特的作用:它是感性和理性的“中介”和“桥梁”,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少了这一环节,认识过程将是不完整的,认识的结果就可能产生缺陷。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理论界忽视对知性范畴的研究,忽视知性思维阶段的地位和作用,导致在社会发展实践中遭受了较大的损失。其表现主要是:或者从感性的混沌直接过渡到理性的丰富,砍掉知性这一认识的中介环节,从而致使理性贬降自己为知性;抑或以理性吞并知性,把知性的抽象思维能力直接等同于理性的抽象思维能力,拒绝作进一步的辩证思考。这两种倾向在我国历史上都曾一再出现。其结果要么是将特殊当一般,把局部当全局;要么就把一般当个别。致使在工作中屡犯“左”的或右的错误,失去许多机遇。建国以来,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同时我们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搞清楚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又说:“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

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的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6]

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过程,有这样一条清晰的认识曲线:完全按照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高度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则越搞越穷。若实行多种所有制的经济体制,虽然社会经济能够得到较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能有较大提高,但又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嫌……几十年来,我们就徘徊于这样一种发展的“怪圈”之中。表现在经济发展的轨迹上,就是“一放”、“一收”的波浪起伏状,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屡犯“左”的或右的错误。认真总结这一历史的经验教训的确有多种原因,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思维方法上缺少了知性这一认识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正因为缺少了这一环节,长期以来我们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错误的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逻辑结论与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混为一谈,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知性认识阶段,但却认为已经达到了积极理性的程度,从而混淆了特殊和一般,错误地把一般当成了个别,致使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走了弯路,犯了错误,受到了损失。这是我们应当永远记取的经验教训,也是我们必须从认识理论上要深刻反思的问题。

黑格尔曾经说过,知性好象上帝的仁德似的,表现在客观世界的一切领域里。这就是说,上帝的仁德是具有普遍性的。黑格尔这个比喻是唯心主义的,但他主要想说明的是知性形式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

参考文献:

- [1]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 [2]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三联书店,1957.
- [3] 陈修斋,杨祖陶.欧洲哲学史稿[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 [4] 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5] 贺麟.黑格尔哲学讲演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 [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责任编辑 杨彬智]